

政治思想論文集

多九主義

蕭高彥・蘇文流 主編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臺北 南港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 (43)

多元主義

蕭高彥 蘇文流 主編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
臺北 南港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多元主義／蕭高彥、蘇文流主編。

--[臺北市]：中研院社科所，民 87
面； 公分。--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所專書：43)

含參考書目

ISBN 957-671-562-8(精裝)

ISBN 957-671-563-6(平裝)

1. 多元論 - 論文， 講詞等

143.7207

87001203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43)

多 元 主 義

主 編 蕭高彥、蘇文流

出 版 者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台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 2 段 128 號

定 價 平裝 400 元

郵政劃撥 10317005 帳號

戶 名 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

電 話 (02) 2789-8120

編 輯 者 林容如、崔承蕙

校 對 者 陳碩鴻

印 刷 者 國軒製版印刷有限公司
中和市立德街 52 巷 11 號二樓

中華民國八十七年三月初版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刷

GPN: 1008700166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編 著 序

「多元主義」為一源遠流長的概念，可上溯至古希臘哲學家針對實體究竟為一或多所展開的爭辯，而隨著一與多兩個陣營不斷的論戰，每一陣營又各自就其立論分化出不同的主張。這項論戰為西洋哲學史上一個歷史悠久而複雜的問題，而在一定程度上，多元論乃為反擊一元論所做的回應。

近代政治領域中，多元主義論述最為人所知的，乃是本世紀初期的英國政治多元論者，他們質疑傳統政治理論中，僅劃分政治社會為國家與個人兩個單元，認為祇用這兩種概念，實無法瞭解現代國家政治運作的真實面貌。現代國家的特徵之一為工業革命以後因經濟活動所興起的各類團體之蓬勃發展，個人成為具有真實存在的某種團體甚至多種團體成員身份的社會人。而在政治參與的意義上，他們亦質疑地域代表不足以充分反映社會上各種不同團體及其成員的政治觀點，而認為祇有增加各層面的職業代表，才能真正落實民主政治的實踐。他們同時主張，應提昇各社會團體之發言權與自主性，強調政府的公僕角色，指出其權力運用之主要目的在為多元社會服務。

二次大戰後，多元主義的論述在美國政治學界繼續發展，但其面貌卻已有所不同。美國的多元主義論述與經驗民主政治理論及行為主義之興起有密切關係，其研究取向從傳統的制度及法律面，轉向動態的個人政治態度與行為，以及各種團體在政治領域中之互動。基本上，乃將國家的統治現象視為一種政治過程，社會上各種利益團體在政治過程中提出不同的要求，促成其所欲之政策。由於政治資源、議題、系絡是分散而多元的，決策過程是以受到各種不同的政治、社會、宗教、經濟、甚至地區等的勢力相互影響、激盪及制衡而形成。此種多元權力的現象使得社會上沒有一個團體能夠長期在政治上居於支

配地位，亦使政治權力受到社會上各種不同團體的制約與平衡，因而使民主政治理念，例如大眾參與、政治穩定、多數決定與少數的保障等得以落實。目前，此一理論及其所引發之爭議仍在美國的政治學界持續出現。

邇來，多元主義又成為政治、社會、法律、哲學及倫理的論述之中，一個重要且極具爭論性的議題。其共同焦點在於重新檢視差異的事實、意義及其所引發的相關規範性問題。現代社會是一差異性紛然並陳的多元社會，這種差異的現實性使我們在理論上不得不思索至少兩個問題：第一是此種人類政治社會生活各個層面的多元性，例如性別、價值、信仰、認同、族群等是如何形成，以及應該如何相互對待的問題；第二是多元分歧的界線問題，也就是從長遠來看，這種多元性如何仍然能夠（或是否需要）構成一個可辨認的、有異於其他社會團體的政治共同體。

上述只是對多元主義所做的一個非常粗略與梗概性的說明，嚴格來說，多元主義其實不宜視之為一種主義，它的核心意義是多樣性（multiplicity），而非一個固定的、單純的主張，將之視為一種基本概念似乎更為適切，而其意涵亦因時代所強調的議題、相關理論、思想系綱等的關連性而有所變化。或許只有當我們將「多元主義」做為輻射點去探討其引發的相關問題時，才能對多元主義有更清晰的瞭解，這也是中研院社科所舉辦「多元主義」研討會的動因。在民國八十五年五月三十至三十一日，我們嘗試匯聚相關學科、學術訓練完全不同的學者來探討多元主義的意義，舉行了這場多元主義研討會議。我們要衷心感謝擔任各種不同角色的會議參與者、本所全體同仁、論文審查人、前所長彭文賢先生、政治組同仁及前主任徐火炎先生、助理陳碩鴻小姐、行政室同仁與出版室的林容如、崔承蕙小姐等的支持與幫忙，使得研討會能順利舉行，也使得本書得以如期出版。本書共收錄了十四篇論文，是由不同角度對多元主義所作的學術性探討，除反映

出多元主義及其相關問題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外，亦可看出國際學界及國內學者對此問題之研究成果。我們特別期待各方先進同道之指正，俾使政治思想與哲學之研究能在國內學界進一步生根落實。

蕭高彥、蘇文流

民國八十七年二月

目 錄

編者序

亞里斯多德思想中的多元主義精神——

從治學風格及對柏拉圖《理想國》的批評說起

..... 謝延庚 1-54

洛克政治思想中多元信仰與政治權威的關係 蘇文流 55-78

道德衝突與政治共識 林天河 79-99

民主政治的建構基礎及其難題：

以「多元主義」理論為主軸 李建良 101-151

法體系的統一性與多元社會 顏厥安 153-194

社群權力的多元模型：方法論上的探討 郭秋永 195-235

多元主義與民主政治：被俘虜的政府與民眾 徐火炎 237-268

韋伯的價值多神論 張旺山 269-306

理解，詮釋與對話：

從哲學詮釋學的實踐觀點論多元主義 張鼎國 307-335

理性討論與民主：

哈伯馬斯之溝通理論的民主涵義 黃瑞祺 337-377

公民身分：認同和差異 林火旺 379-409

麥可·瓦瑟論多元族群社會的國家認同 江宜樺 411-440

價值多元主義、相對主義與政治認同：

柏林雷茲與葛雷論點之分析 蔡英文 441-485

多元文化與承認政治論 蕭高彥 487-509

《多元主義》 蕭高彥、蘇文流主編
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專書(43)，頁1-54
民國87年3月，臺灣，臺北

亞里斯多德思想中的多元主義精神—— 從治學風格及對柏拉圖《理想國》的批評說起

謝 延 庚*

摘 要

論者皆謂亞里斯多德師出柏拉圖之門，故此二者在思想上頗為相似，本文並不否定此一論點。但本文所要指出者乃亞氏在若干方面仍多與其師有甚大之差異，其中之一即為亞氏具有濃厚的多元主義色彩。雖然多元主義之意涵十分豐富，且學者對其內容仍然頗多爭論，但吾人似可將之視為一元論之反義詞，其要義在於「多樣化」或排斥「定於一」，本文即在嘗試論證亞里斯多德思想中隱含了多元主義的精神。此一論證擬分從兩方面進行：一方面從治學方式剖析亞氏的治學風格。本文發現，亞氏所採取的是一種多元的治學途徑，無論是哲學、政治學、倫理學、以及各種自然科學，他總是從不同角度看待問題，不輕信、不苟同，帶有某種程度的懷疑主義色彩，因而襯托出其多元主義的精神。另一方面，從亞氏對柏拉圖《理想國》的批評，尤其是對其「統一」的觀念與共產共妻主張的非議，也反映出亞氏思想中多元主義的意涵。

關鍵詞：亞里斯多德；柏拉圖；多元主義；多元治學途徑；實踐智慧。

* 私立東海大學公共行政研究所教授

壹、前　言

亞里斯多德是古希臘的思想家，多元主義(pluralism)是近代的產物，二者並無關聯。然而，多年來，在教學研究的印象中，總覺得這位古代思想家，所思所言，有很多地方，即使以近代眼光視之，或比之於近代思想，亦毫不遜色。亞氏學術思想的特色甚多，筆者為之神馳不已者，輒為其思維境界的寬廣與超越，以及在認知上的氣象萬千。假設多元主義是一元論(monism)的相反字，¹其要義在於「多樣化」或排斥「定於一」，則亞里斯多德思想中的多元主義精神是隱約可見的。

亞氏著述之豐富，可謂汗牛充棟，且游走於諸多學科領域，涉獵之廣及思慮之精，令人讚歎！嚴格地說，如欲博覽亞氏作品逐一檢視其與多元主義的關係，自付力有未逮，即使相當程度的廣泛探討，恐亦非本文篇幅所能負荷。故擬舉一反三，選擇某些具有概括性和代表性的課題加以探討與論證。

全文共分為兩部份：

其一、多元的治學途徑：概括析述亞氏的治學風格。不論是哲學、倫理學、政治學、以及品類不一的自然科學之研究，他總是依循不同角度看待問題，不輕信，不苟同，某種程度地帶有懷疑主義(skepticism)色彩，多元主義精神在其中矣。

其二、對柏拉圖《理想國》的批評：落實的說，是對柏拉圖的「統一」(unity)觀念和共產共妻(Platonic Communism)主張的批評。亞氏透過多學科及多層面的途徑，提出種種非議，就近代意義而言，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間接地反映其思想中多元主義的意味。

筆者之所以選擇上述兩個課題作為全文脈絡和支柱，乃是經過千迴百轉的思考使然。按亞里斯多德的著述門類繁多，唯氏之治學風格，並不侷限於一隅，而是總體的，最能貫穿全局，既指涉多學科，

又反映多面向，以及不同角度的揮灑空間，它彷彿是一道側門，可從而窺視其無所遮攔的洞見，俾得以衡度其思想中的多元主義精神，而不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或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另一課題，對柏拉圖《理想國》的批評——不論是對「定於一」及「共產共妻」的批評，皆具代表性，足以凸顯亞氏思想中的多元主義，反而得以獲致「能見其大」的清明之感。

本文無意於牽強附會，將亞氏某些理論與多元主義劃上等號，而是從這位古代思想家的作品，掇拾相關的見解，透過闡釋、評析、和論證，以顯示其所蘊含者，委實與多元主義聲氣相通，有異曲同工之妙。

貳、多元的治學途徑

亞里斯多德 (Aristotle, 384-322 B.C.) 追隨柏拉圖 (Plato) 游讀，凡20年，對其師極為崇拜，柏氏死後，亞氏偕其同門為柏氏之未出版之講義《論善》(*On the Good*) 作序。² 吾人不免嘖嘖稱奇者，彼之學術思想竟迥異於柏拉圖，不僅學說之內容截然不同，特別是辯究的態度與方法更是大異其趣。

亞氏名滿天下而又廣為流傳的代表作，當推《政治學》(*Politics*) 與《倫理學》(*Ethics*)，常為研究亞氏政治思想的基本素材，一如研究柏拉圖政治思想須依據《理想國》(*Republic*)、《政治家》(*Statesman*) 及《法律篇》(*Laws*)，方能得其梗概。其實，亞氏在上述成名作之外，其著述所指涉之領域，極為廣袤，總的來說，舉凡哲學、史學、心理學、生物學、甚至醫學等，³ 皆有所論列；易言之，亞氏著書立說，不限於人文及社會科學，還包括動物學、物理學、以及廣大的自然科學，⁴ 對於這般包羅萬象的研究範圍，威廉·艾本斯坦 (William Ebenstein) 稱亞里斯多德具有「百科全書式的興趣與造詣」(encyclopedic interest and accomplishment)，他說：「在哲學史上，未

曾有人能出其右」。⁵ 或許因為這個緣故，亞氏在倫理學及政治學中所展現的最大特色厥為思維上的多樣化，或依循不同角度看待問題，彷彿刻意超越「定於一」的理則。易言之，亞氏的學植基礎，特別是治學的多元途徑，很自然地擺脫其師門宗派的窠臼，如果說柏拉圖的價值觀是絕對的，在觀念世界中尋求最高之善 (the highest good) (至少 *Republic* 是如此)，則亞里斯多德的價值觀是相對的，不以獨一無二的理念為依歸；概括而言，柏拉圖的方法是演繹的，亞氏則重歸納；論事推理，前者似為平面的或直線的，後者則是立體的或曲折迂迴的。

其實，上述兩位思想家雖具不同風格，但並非全然南轅北轍，兩人相同之處亦復不少：同視國家為道德的機體，同視優美生活為政治之目的，同視智識為美德之母，同重國家教育，同尚中庸節制，而政治思想跳不出市府國家之背景，亦正彼此若一。⁶ 吾人以為，亞里斯多德之所以成為亞里斯多德，或者可以說，亞氏之所以註定與其師分道揚鑣，乃是種因於方法論上的歧異。

在思想史上，亞里斯多德可說是徘徊於哲學與科學之間的，這麼說，恐怕是失之於粗疏，因為在亞氏近50種的著作中，所指涉的領域至為廣闊，論哲學，不止於人生觀和知識論，並有其力作《形上學》(*Metaphysics*)，另有論及「天道」者，如 *On the Heavens*、*On the Universe* (此書被指為非亞氏手筆)，幾已及於神學範圍，⁷ 至於科學這個命題，亞氏更為重視，對於現代人所謂的基礎科學，如數學、物理學其有相當的研究，其他包括《氣象學》(*Meteorology*) (亞氏的著作之一) 在內的若干種自然科學，亦多所涉獵，這般的治學途徑，自然會造就學術思想的特殊風格。有人說，亞氏長於邏輯思考和認知上富有多元主義精神，顯然與其深受科學薰陶有關，⁸ 其所顯現的智慧正是他所衷心嚮往和一再推崇的“practical wisdom”⁹ (*EN* 1141b4-16)。

宏觀地說，亞里斯多德皓首窮經致力於哲學與科學之鑽研，他似乎有意使二者相通，讓天道與人生相互關照，其間雖然在科際之中觸

動千絲萬縷，但所知所悟無非是穹蒼浩渺與人事多變，乃提醒面對難以蠡測的課題，所能獲致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相對的和或然的，故學者的視野應力求寬闊，且應依循不同角度看待問題，易言之，研究的態度不先入為主，研究的方法不一而足，亞氏治學之多元主義色彩在其中矣。明乎此，當可理解亞氏何以批評其師柏拉圖「吾道一以貫之」及尋求問題之絕對答案的態度與方法了。

假設窮究天人的學問是屬於哲學命題，那麼格物致知如物理學等自然科學跟哲學命題也是相通的，亞氏確有此意，在 *Metaphysics* 一書開頭便說「人天生即具有求知欲」(All men by nature desire to know)，對於這位游走科際的思想家而言，求知不可能不涉及科學，而科學在某種層次上亦有哲學的影子。譬如亞氏在肯定科學的精確性之同時，總是提示不排除例外或意外的可能性，因而認定科學所求取者不僅是必然，亦是最大可能的或然。¹⁰ 這位古代哲學家的科學觀，今日科學家未必認同，倘若吾人越過界說的爭議，當更能領會亞氏暗示的哲理，乃在於科學亦有其哲學境界，去年(1995)出版定名為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ristotle* 的論文集，其中由牛津、劍橋出身，現任教於奧斯丁・德州大學的哲學教授 R. J. Hankinson 提供之“*Philosophy of Science*”一文，從所謂「科學的哲學」之命名，大致可反映上述的意涵。¹¹

歸納言之，亞氏思想中多元主義精神的呈現，並非偶然，多元的治學途徑實為關鍵因素。透過多學科的探索，在尋求解答的曲折過程中，乃得以體認答案未必是絕對的，也未必是單一的；換言之，他的思考邏輯，顯然具有排除「只知其一」的強烈傾向，有一項值得玩味的背景資料可資論證，據講授古代哲學也是《亞里斯多德著作牛津譯本》(*The Oxford Translation of Aristotle's Works*)的編纂者柏恩斯(Jonathan Barnes)教授指出，在科學領域中，亞氏相對地對數學投注的時間較少，¹² 跟他在物理學或生物學方面所付出的不成比例，原因是前者所處理的和所驗證的是“what is 'always' true”，而後者在宗旨

上雖無二致，但不同的是也要尋求“what holds for the most part”。¹³ 更確切的說，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只能掌握最大部份的研究結果，這恐怕是無可奈何的限制，或許這種限制，無形中造就亞氏的治學風格以至於他的學術思想，流露多元論的神髓。

亞里斯多德治學的態度與方法，何以會洋溢類乎近代多元論的神采？尋繹其緣由，似與他年輕時代即沉浸於自然科學之研究有關。落實的說，這位醫生之子一開始就被經驗世界所吸引，並以為研究的對象，他認為唯有經驗世界是實在的世界，經驗是知識之基礎與出發點，學問之根本即由之而生，亞里斯多德心目中的宇宙可說是多元的，¹⁴ 不可能從某一點看全面。所以他投入自然科學中多學科的研究，也因此造就了求真求實且至為嚴謹的治學風格。他總以為自然界的實質是不可知的，析言之，物象的多樣化、差異性、及其變動不居，恐為吾人在知識上的諸多限制，這種存疑的和警覺「理未易明」的態度，顯然是由物理學和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訓練中得來，譬如亞氏在動物學的研究中，曾設想單性生殖的可能性 (the possibility of parthenogenesis) (GA 2.5, 741a32ff)，¹⁵ 亦曾付出大量的時間仔細觀察蜂的習性，後來他坦白承認所獲資料不足以論證其研究結果 (HA 5. 21-22; 9.40, 623b7-627b22; GA 3.10, 760b29)，¹⁶ 基於這般求知若渴的熱誠，以及「學然後知不足」的態度，亞氏雖然在動物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寫成 *History of Animals*、*Generation of Animals*、*Parts of Animals*、*Movement of Animals* 等作品，但他仍然覺得所知有限，疑點甚多 (PA 2.16, 659a19; 3.2, 663a11; 4.12, 694a20)。¹⁷

物理學上的動力現象，亞里斯多德雖確知其「恆動不已」(such motions ultimately come to an end)，但在解釋其所以然之際，卻為之深感困惑。¹⁸ 總之，亞氏對自然科學的鑽研，蘊育出務實的和存疑的精神，誠如韓金森 (R. J. Hankinson) 教授所言，亞氏情願揚棄嚴格的相似論與相反論 “Aristotle's willingness to abandon strict parallelisms and contrarieties”，¹⁹ 而傾向於多重變數的並列 (juxtaposition) 或解釋

上的互補與混合 (mixture)，²⁰甚至以爲「未知」或「不可知」者，比比皆然。這種排斥「定於一」的多元主義精神，躍然紙上，明顯地係得之於自然科學，而又彌漫於總體的學術思想。論者嘗謂：「亞里斯多德的全部哲學（醫學、自然哲學、社會哲學）都根據於一種進化或發展的觀念」。又說：「亞里斯多德玄學上的基本觀念，就是形式與實質的區別。形式就是物質表現於外的現象，也就是我們用感覺所能得知的萬事萬物；實質是事物的本身，可以離開我們的感覺而獨立存在，它們到底如何，是我們不得而知的」。²¹

的確，進化或發展的觀念，也就是變動不居的觀念，在亞氏的思想中，是貫穿全局的，這顯然是從生物學、天文學、特別是物理學等領域所匯聚的認識，然後又在哲學中充分顯現，譬如玄學 (Metaphysics) 即居於物理學之後，因而得 “Meta ta physica” (在物理學之後之意) 之名。²² 物理學上的動力現象，在玄學 (亞氏稱爲第一原理) 中，亞氏乃引申之爲「世事多變」的哲理，²³有一則在古希臘燙炙人口，後世仍然引人入勝的掌故：赫拉克利托斯 (Heraclitus) 說，你不能在同一條河裏濯足兩次 (it is not possible to step into the same river twice)，亞氏則說，甚至連一次都不可能 (it is not possible even once)。²⁴ 且不論二人之言何者爲是，其所隱喻自然界以至於人間的多變，實無二致。

亞氏此一論點與希臘的哲人派 (Sophists) 略同，按此派又名詭辯派或懷疑論者，亦稱「希臘之百科全書派」，彼等倡言宇宙間一切皆變動不居，因而否定不變的行爲法則 (fixed rules of conduct)。²⁵ 說到懷疑論者，亞氏雖不像哲人派中的高奇亞 (Gorgias) 那麼偏激，²⁶但他那種凡事存疑的認知態度與思維方法，在辨析「什麼是人」的命題中，顯然與著眼於「人之同」的蘇格拉底和柏拉圖格格不入，倒是跟重視「人之異」的哲人派聲氣相通。是以亞氏在哲學論證中，解釋人對事物之認識並非一成不變時，曾不止一次地引述哲人派巨頭普魯達哥拉 (Protagoras) 的觀點，²⁷然而，一般的印象常以爲亞里斯多德乃

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傳人，而柏拉圖理想國的對話總是跟哲人派對立的，因而忽視了或掩蓋了亞氏的此一特色，不可不察。

亞里斯多德或許由於家學淵源，早期即傾心於醫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從而錘鍊出嚴謹的治學態度與方法，不輕信，不苟同，某種程度地帶有懷疑論者 (skeptics) 的色彩，很自然地反映多元主義 (pluralism) 的精神，故論者嘗謂：「亞里斯多德的多元主義可說是對懷疑主義的回應」“Aristotle's pluralism serves as a rejoinder to skepticism”。²⁸ 此外，亞氏重視經驗研究亦與多元主義精神相契合，他覺得凡是與一般經驗過份不同的東西，大抵都有毛病，故有言曰：「吾人必須從已知之事著手」“we must begin from what we know”，這是與柏拉圖迥異之處。

筆者以爲，亞氏思想的多元主義精神，乃是由治學途徑孕育而來，先從自然科學的研究中展現，後洋溢於玄學、倫理學、及政治學的脈絡之中。

參、對柏拉圖《理想國》的批評

有人說：「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原理一部份就是建立在對於柏拉圖理想國的批評上」。²⁹ 這裡所指的是，亞氏對柏拉圖理想國中要求的「統一」(unity) 觀念及共產共妻制度的批評，就近代意義而言，亞氏從不同角度提出種種非議，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實足以顯現其思想中的多元主義色彩。

一、對「統一」觀念的批評

柏拉圖在《理想國》對話錄中所標榜的「統一」，可說是其正義國家命脈所繫的價值觀，至關緊要。在柏氏的心目中，理想國的最高境界就是寄託於完美的和諧與統一 (perfect harmony and unity)，³⁰ 柏氏闡釋之云：

『一國之所謂惡，當無更惡於意見參差，人民不能一致；而所謂善，亦莫善於人民有團結之力，而能遇事一致。……凡人民有團結力之國，則遇欣喜之事，一致欣喜；遇悲痛之事，一致悲痛。……設遇一事，而國之人乃欣喜者半，悲痛者亦半，則表示其國民徒有私見，無一致之能力，而其國之組織必未完善無疑。……此種參差而不一致，大抵以不明「我的」與「非我的」，「他的」與「非他的」之真義所致。……設一國之中，其人民皆知「我的」與「非我的」之真義，而能一致用此二語，則非完善之國乎？……此種景象，實與人體相去不遠，設吾儕有人僅傷一指，即彷彿全體咸集於腦部，而腦實為之中心點，故受傷者雖僅一指，而覺其痛苦者全部。以是之故，吾儕不謂其指有痛苦，而謂其人有痛苦也。不獨一指為然，凡人身不論何部受痛苦，或脫離痛苦，吾覺其痛苦與愉快，不獨在直接之部份，全體皆然也。……然則於完善之國家中，人民遇快樂或悲憤之事，則全國之人，將以其所遇為己遇，而悉與之表示快樂悲憤之同情。……彼等對於不論何事何物，既確知有共同之關係，則自莫不曰，此與余有關係者；有此共同之關係，自有共同之快樂，與共同之痛苦。』³¹

亞里斯多德對柏拉圖理想國中追求十足的和諧與統一之批評，可歸納為兩個要點：其一是不可能，其二是不相宜。首先，他就國家的性質作鞭辟入裏的解析，他說：「國家不僅是由眾多的人聚積而成，並且包括不同種類的人。」(a state is not made up only of so many men, but of different kinds of men.) 進而以一句最為深刻亦富有哲理的話作詮釋：「因為同質的人並不能組成國家」(for similars do not constitute a state)，³² 亞氏乃總結國家之性質實為多元 (plurality)，倘若如柏氏所企盼 “that the greater the unity of the state the better”，即愈統一愈好的話，亞氏詰問，設若「定於一」達到那麼高的程度，國家還成其為國家嗎？並推演的說，一味地追求一致化，則國家將變成家庭。家庭

又將變成個人了，其結果則是毀了這個國家 (*it would b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tate*)。³³ 基於這個緣故，亞氏認為柏拉圖設想凝聚眾意合而為一 (*unanimity*) 的價值觀，讀起來頗為引人入勝 (*attractive*)，殊不知那是不可能的 (*impossible*)。³⁴

上述的見解，並非祇見諸於《政治學》，他在《物理學》及《形上學》等著作中，亦持類似的看法，譬如亞氏曾強調自然界中的事物，皆有其自然本性，這種自然本性相應於每一個體的獨特性而有所不同，即使是同種生物，其自然本性也未必完全相同。這種特質，非人造器具可比，自然事物的發展取決於其自然本性，換句話說，自然事物是自主的，也是自由的；因此，不同生物之生活型態差異不能強求一致，蓋其所以各異其趣，必定有其生命的奧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生物的自然本性。³⁵

自然界與生物界尚且如此，人為萬物之靈，具有自主與自由的特性，更是不辯自明。基於這般的理則，亞氏在他涉獵廣博或專精的多學科中，互為參證，一貫地體認：宇宙以至於人間，吾人欲瞭解多元而又多變的事物，基本上是戛乎其難，故在認知上應透過不同的標準 (*different criteria*)、依循不同的網絡 (*different contexts*)，慎思明辨，才不致失之粗疏，豈可大而化之或一概而論 (*to count as one*)，甚至強求一致？³⁶

上述哲理上的論證，充分顯示亞氏的政治學與其自然哲學是融會貫通的。³⁷ 而對於《理想國》揭示的「統一」 (*unity*)，認定其違反自然本性，所以是不可能的。

其二，亞氏認為理想國的「統一」即使得以勉強而行之，亦不可取。他曾諄諄告戒，並總結的說：“so that we ought not to attain this greatest unity even if we could, for it would be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tate” (*Pol 1261b7-9*)，³⁸ 意謂極大化的「定於一」，縱然能夠，吾人亦當有所不為，因那將會導致國家的毀滅。亞氏作如是觀的理由不一而足，茲略舉其肇肇大者。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的思想雖皆以希